

參閱文稿

北京華研有限公司
香港大風出版社

No. 2022~15

2022年11月22日

編者按：雅斯貝斯：“西方歷史哲學的基礎根植於基督教信仰之中。”¹ 托克維爾：“美國人在他們的頭腦中把基督教和自由幾乎混為一體，以致叫他們想這個而不想那個，簡直是不可能的。”² 亨廷頓：“美國形成了清教社會，”³ 喬治·布什：“沒有哪個社會比美國社會更宗教化。”⁴ “任何複雜的社會法律關係都與上帝之國的愛相關。”奧巴馬篤信尼布爾的基督教現實主義：“上帝之國似乎是歷史中一種內在力量，終極目標是建立一個公正的大同世界。…朝氣蓬勃的美國文明也把‘美國夢’同基督教上帝之國的圖景混為一談。”⁵ 東正教比天主教，傳統上更加積極入世。蘇聯解體的信仰危機+道德敗壞≠向錢看成南懷瑾：〈失心瘋的社會〉。⁶

¹ 雅斯貝斯：《歷史的起源與目標》5頁，瀟江出版社2019。

² “因此，法律雖然允許美國人自行決定一切，但宗教卻阻止他們想入非非，並禁止他們恣意妄為。”（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上卷339~340頁，商務印書館1991）

³ “英國發生了清教革命，卻沒能形成清教社會；美國形成了清教社會，卻沒有發生清教革命。…清教革命不僅是英國歷史的一次獨特事件，也是美國歷史的原型之一。英國革命的痛苦、興奮、激情、道德主義和改革意識，都在美國歷史的重大時刻多次重現——17世紀末的殖民地動蕩、18世紀的美國革命以及此後歷次信條激情時期，等等。…宗教復興主義是整個19世紀社會改革的主要源頭。”（亨廷頓：《美國政治：激蕩於理想與現實之間》245~246、262頁，新華出版社2017）

⁴ 蔣棟元：《走進神秘的殿堂——摩門教》1頁，光明日報出版社2011。

⁵ 尼布爾：《人的本性與命運》下卷463、506、571頁20註，貴州人民出版社2006。

⁶ “以我對這個社會的觀察，尤其我們的國家、社會，現在統統走入了瘋狂的狀態。在中醫有個

天国在你心中

托尔斯泰⁷

在我们看来，几千年以前经过了从个人的、动物的人生观向社会人生观的转变，这种转变似乎是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可是，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持续了 1800 年之久的转变，却似乎是不确定的、神奇的和令人吃惊的。之所以如此，不过是因为另一个转变已经完成了，由那一人生观的转变而导致的实践已经成为人们下意识的行为，而现在正在发生着的转变却仍然没有完成，仍然需要我们自觉地完成这一过程。

社会的人生观渗透到人们的意识中去，整整经历了数百年甚至数千年的时间。它经过了许多种形式，现在，通过遗传、教育和习惯的灌输，它已经进入了无意识的领域，在我们看来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然而，五千年以前，它在人们看来恰恰是神奇的和令人惊讶的，这与现今我们理解基督教的信仰的真实意义的情形是相同的。

现在，在我们看来，基督教的信仰，诸如博爱、消灭国家界限、消灭私有财产以及那一奇怪的不用暴力反抗罪恶的指令，都是不可能的要求。但是，在数千年以前最原始的时代——许多要求也是被这样认为的，不仅国家的要求，家庭的要求也是如此，例如，父母要抚养孩子，丈夫与妻子之间要相互忠诚等等。国家的要求看起来更加奇怪甚至是残忍的：

病叫作失心症，忘失了心，發瘋了。今天全世界以經濟金融決定政治的方向，使全人類知識分子發瘋了，尤其像銀行界同諸位，每天困在數字和錢堆裡頭，忘記了自己的心了，很茫然。”

（南懷瑾講述：《21 世紀初的前言後語》下冊 270 頁，老古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12）

⁷ 节选自列夫·托尔斯泰：《天国在你心中·我们的生活与基督教意识之间的矛盾》，孙晓春译，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4，93~110 页。

国民要服从指定的权威，要交纳税赋，要为保卫他的国家去打仗，等等。在我们看来，所有那些要求都是简单的、可以理解的、自然的，没有任何奇异和深奥之处；可是，在三千年或者五千年以前，这却似乎是在要求着不可能的东西。

这就是社会的人生观成为宗教的基础的原因——因为在那个时代，在人们看来，社会人生观似乎是不可思议的、神秘的和超自然的。现在，我们已经超越了那个时代，我们看到了人们结合为家庭、共同体以及国家的理性基础。但是，在古代，这些结合的要求却是以一种超自然的权威的名义呈现在人们面前，并且凭借这种权威而获得支持的。

家长制的宗教神化了家庭、种族和民族，国家的宗教神化了国王和皇帝。甚至是当今，大多数无知的人们——如我们的农民，他们便把沙皇看作是地上的上帝——之所以服从国家的法律，并不是因为他们意识到了这样做的必要性，也不是因为他们认识到了国家的意义，而仅仅是出于一种宗教情结。

同样的情形，基督教教义现在也被那些有着社会的或异教徒的人生观的人们视为不可思议的宗教，尽管在事实上它没有任何神秘或不可思议之处。很明显，这一教义与人类现在已经达到的物质发展阶段是相适应的，所以，它也不可避免地要为人们所接受。

一个时代将要到来，已经在到来，在这一时代里，基督教的平等原则（人人皆兄弟、财产公有、不用暴力反抗恶人）将与当今有关家庭、社会以及国家生活的原则一样，被人们看作是自然的和简单的。

无论是个人还是整个人类，都不能逆历史潮流而动。社会、家庭以及国家的人生观已经过时，它也需要与时俱进并且接受更高尚的人生观。这就是当今所发生的一切。

这一运动将会通过两种方式实现：通过精神的原因而自觉地实现或者在物质原因的推动下不知不觉地实现。

单个人仅仅是在理智的促动下而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的事情很少发生，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尽管理性已经为他们指出了一个新的目标和新的人生观，但是，他们仍然要延续以往的生活方式。只有在这种生活方式与他的良知已经发生严重的对立，并且已经感到无法忍受的时候，这种变化才会发生。人类也是如此，虽然他们从宗教领袖那里获得了一种新的人生观，认清了他们将要为之努力的目标，但在很长的时间里，他们仍然要像以往那样生活，只有在看到旧的生活已经无法再继续下去的时候，他们才会接受新的人生观。

尽管改变生活的必要性已经为宗教领袖认识到了，并且做了系统的阐述，这也为那些最聪明的人们所承认，可是，大多数人，尽管他们对于这些领袖有着虔诚的态度——也就是说，尽管他们相信他们的教义——但却是仍然在迷茫的状态下受着以往人生观的左右。这就如同一个家庭的父亲，虽然已经知道在他的年龄阶段上应该如何地生活，依然习惯地、无忧无虑地享受着童年时代的快乐。

这正是当今人类行将经历的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转变过程中发生着的事情。人类已经度过了它的社会的和国家的阶段，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它已经懂得，在这个新的历史阶段上，应该成为人们生活基础的信仰是什么，但是，在惯性的作用下，人们仍然保持着原有的生活方式。由于新的人生观与实际生活之间的不一致，导致了一系列的矛盾和苦难，这些矛盾在困扰着我们的生活，从而要求我们的生活发生改变。

把我们生活的实践与生活的历史加以比较，就难免对我们的生活条件与我们的意识之间的这种矛盾而震惊。

我们的全部生活与我们知道并且相信是必要和正确的信念之间，处在一种显而易见的矛盾之中。这种矛盾普遍存在于所有的事物中：在我们全部的经济的、政治的和国际事务中。我们似乎已经忘记了我们所懂

得的东西，并且为了我们现在相信的原则（我们无法不相信它，因为这是我们生活的惟一基石）已经放弃了它们，却在做那些与我们的良知和常识截然相反的事情。

我们被这些原则导入了政治、经济和国际问题之中，这些问题与三千或五千年以前的人们是相适应的，但与我们现实的意识与生活环境却是直接对立的。

对于一个希腊人来说，生活在把人类区分为主人与奴隶的环境下是十分惬意的，因为他相信，这种差别是由神决定的，不可能有其他的例外。可是，这种差别在我们的时代可能吗？

一个生活在古代社会的人可以相信，他有权为了享有这个世界上美好的东西而使他人蒙受损失，使他们一代一代的受苦，因为他相信，人们有着不同的血统，有劣等人，有贵族，有贾菲斯人（Japhetic），有含米特人（Hamitic）。不仅最伟大的智者和人类的导师柏拉图（Plato）和亚里士多德（Aristotle）认为奴隶制的存在是合理的，并且证明奴隶制是合法的，就是在三个世纪以前，在描述乌托邦（Utopia）——一种未来的理想社会时——人们仍然无法想像一个没有奴隶制的社会。

古代人甚至是中世纪的人们坚定地相信，人是不平等的，只有波斯人、希腊人、罗马人，或者只有法兰克人才是真正的人。但是，我们现在却无法相信这些。现在，那些拥护贵族制的人们和有爱国情感的人们，也可能相信古代人所断言的这一切。

即使我们从来没有听过和读过它所清晰表达的意思，我们自己也从来没有这样表达过，但是我们都以我们的全部心灵——从真正的基督教氛围中汲取了这一意识——我们知道，也不能不知道，基督教教义的这一根本真理：无论我们生活在哪里，无论我们操着什么语言，我们都是圣父之子；我们都是兄弟，共同的父亲根植于我们的心灵之中。

无论一个人的思想方式如何，受过何等程度的教育——是何种程度

上的有教养的自由主义者，哪一个阵营的哲学家；或者是哪一个学派的科学家或经济学家；或者是一个没有教养的人，这个教派或那个教派的僧侣——我们这个时代每个人都知道，每个人都拥有同等的生存权利，分享利益的权利，没有哪一些人比其他人更加优秀或更加低劣，而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每个人都知道这是不证自明的。然而，与此同时，他也会看到在他周围，人们被划分为两个阶级：一个阶级劳动，承受着压迫、贫困和苦难；另一个阶级清闲，压迫着另一个阶级，生活在奢侈与享乐之中。他不仅看到了这一点，而且也自觉不自觉地、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参与着这种为他的良知所谴责的差别，他只能承受着这种矛盾意识的折磨，只能由于他亲身参与这种差别而承受着良心的折磨。

或者是主人，或者是奴隶，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只能体验一种不间断的和痛苦的矛盾，这种矛盾就是他的意识与现实生活之间的矛盾，承受着由这种矛盾带来的痛苦。

受苦受难的大众，人类中的绝大多数，终其一生承受着无尽的、无意义的和无望的苦难和贫穷，承受着大部分由于他们意识到现实与应该之间的明显矛盾而带来的痛苦，而所谓“应该”的根据则是他们自己的信仰，也是那些把他们置于这样的现实地位的人们的信仰。

他们知道自己的奴隶身份，他们憎恨穷困，也憎恨迎合使少数人的欲望而使他们如此固苦的社会黑暗。他们知道这一点，并且清楚地表达了这一意识。这种意识不仅增加了他们的痛苦，而且构成了他们的道德本质。

一个古代的奴隶相信，他自己是天生的奴隶，可是我们的劳动者在感到他自己是一个奴隶的同时，也晓得他自己不应该这样，所以，他们在经受着坦塔罗斯（Tantalus）折磨，⁸ 永远地渴望着，但却永远也不能

⁸ 坦塔罗斯，传说是宙斯之子，因为泄露天机而受罚站在水中，水的上面有水果，当他想喝水时，水位便下降，想吃水果时，树上的果子便上升，所以他的愿望永远也无法得到满足。

— 译者

获得那些可能或者应该属于他的东西。由现实与应该之间的矛盾造成的劳动阶级的痛苦，正在由于妒嫉和由这种意识而导致的仇恨而数十倍地增加。

我们这个时代的劳动者，尽管他的工作要比古代的奴隶轻松得多，尽管他获得了每天八小时工作制和日三元钱的日工资，但却没有免于痛苦，因为——他们在制造自己不喜欢的东西，他们的劳动不是为了自己，也不是出于自己的意愿，而是在强制之下的劳动，而是为了满足那些喜欢奢侈、游手好闲的人们的欲望而劳动，特别是为了极少数富人（工厂或作坊的所有者）的利益而劳动——他们知道，在这个世界里，所有这一切都将继续下去，这个世界，不仅是科学地阐明了只有劳动才是财富，剥削别人的劳动不正义、可耻、要受到法律的惩罚这一道理的世界，而且也是一个宣扬基督教有关我们都是兄弟、我们的尊严与价值仅仅在于为我们的邻居服务而不是剥削他人这一教义的世界。

他们知道所有这一切，但却只能承受着由这种现实与应该之间的尖锐矛盾带来的巨大痛苦。“根据全部的道德原则以及所有人的信仰，”一个工人对他自己说，“我应该是自由的，与其他人应该是平等的，也应该是为人们所深爱的。可我却是个奴隶，屈辱的和被人痛恨的！”而他也充满着仇恨，在寻求着一种方法，以便摆脱现实中的地位、摆脱那些把他们压倒在地并且骑在他们身上的敌人。

人们说：“工人想要把他们自己置于资本家的位置上，想要让穷人取代富人，这种想法是应该受到责备的。”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在一个认为奴隶和主人、富有和贫穷是上帝的意志的世界里，如果工人想要这样做的话，他们当然是错的；可是，他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声称信仰《福音书》的教义的世界里，《福音书》的首要原则就是，全人类都是上帝的儿子，所以人人皆兄弟，人人平等。然而，人们却在试图掩盖这一教义。基督教生活的首要条件是爱，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

作为所谓有教养的阶级的一员，每一个这样的人，如果他相信一切，如果不信奉四海之内皆兄弟而是相信人道的话，如果不相信人道而相信正义的话，如果不相信正义而是相信科学的话，他就会生活在这种巨大的矛盾与痛苦之中；与此同时，他也知道，他依赖于所有现实条件的全部生活与这一切——基督教的原则、人道、正义和科学等等——是直接矛盾的。

他知道他成长于其中的全部习惯，不经历痛苦就不会放弃的全部习惯，只有通过对被压迫阶级的折磨，通常是致命的劳作才能够满足——这就是，最臭名昭著和厚颜无耻地违反那些基督教的原则、人道、正义，甚至科学（我指的是政治经济的需要），而这些原则正是他所信仰的。他宣扬人人皆兄弟的原则，信奉人道、正义和科学，可是他的日常生活却使他所反对的对于工人的压迫成为必要，他的全部生活都依赖于这种压迫所带来的利益，他不仅这样地生活，而且他也要身体力行地维持这一现状，这与他所信仰的一切都是完全矛盾的。

我们都是兄弟，可是，每天早晨，一个兄弟或者一个姐妹却要为我倒尿壶。我们都是兄弟，可是每天早晨，我一定要使用一面镜子，抽一支雪茄，吃一些糖，等等——所有这些物品的生产都在损害着我的兄弟姐妹们的健康，他们与我是平等的。可是我需要这些物品，甚至迫切需要这些物品。⁹ 我们是兄弟，可是我以在银行或者公司、商店工作而谋生，

⁹ 当托尔斯泰 1893 年在俄国写这几行字的时候，烟草加工、食糖提炼和往镜子上镀水银，是在损害许多工人的健康的条件下进行的。

雪茄和手工卷烟是一种很大的产业，有一些是使用血汗劳工的家庭工厂，在这种工厂里工作的工人，由于吸入烟草微粒而患上肺病，在大型的工人密集的烟草工厂里，这种尘灰也影响着工人们健康。

在镜子的制造中使用了水银，工人也由于它的毒性而患病。

在大型而高温的食糖提炼厂，取自屠宰厂用于炼糖的腐血的气味，可以使工人患病，他们通常都患有疾病。

试图把我的兄弟所需要的物品卖个高价。我们都是兄弟，可是，我们却依靠审问、审判和谴责那些小偷和妓女而挣得的工资而谋生，他们的存在是我安逸的生活方式的产物，我知道，他们只是需要改过自新，而不是被惩罚。我们都是兄弟，可是我却依赖向贫苦的工人征税而挣得的工资过活，而我征来的税金却被用来为那些有闲阶级和富人购买奢侈品。我们都是兄弟，可是我由于宣传一种连我自己都不相信的虚假的基督教信仰而挣得薪水，正是这种信仰阻碍了人们理解真理。我们都是兄弟，可是我只是用我的知识、医术或文学著作卖给穷人。我们都是兄弟，可是我却因为自己准备参与杀人而挣得一份工资，我学会了杀人或者制造武器炸药，或者修建堡垒。

我们上流社会的全部生活是永远矛盾的，这种生活愈是烦恼，我们的道德意识便愈是敏感。

一个有着敏感的良知的人，如果他如此生活的话，就只会感到痛苦。对他来说，解除这种痛苦的惟一途径就是抑制他的良知，可是，即使这种人能够成功地遏制自己的良知，可是他们却无法摆脱恐惧。上流社会或者统治阶级中的那些麻木的人们，他们已经抑制了自己的良知，但却忍受着恐惧与仇恨的折磨。他们只能忍受着这种折磨。他们知道，在工人阶级中间存在着的对他们的仇恨，那是不可避免的仇恨。他们知道，工人们已经懂得，他们受到了欺骗和剥削，为了推翻压迫和向压迫者复仇，他们正在把自己组织起来。剥削阶级看到，工人阶级的团结、罢工和五一节的庆典，在传递着令他们恐惧的信号，他们所体验到的恐惧正在腐蚀着他们的生活，最终将会变成他们的自我防卫和仇恨的意识。他们知道，在与受他们压迫的奴隶的斗争中稍有放松，他们就将灭亡，因

在现代制造方法中，所有这些情形都已经大大地改善，上面提到的三种工业已经不再必然地影响人们的健康，不过其他职业病，如矽肺、石棉肺，在当今社会仍有报道。— A. M.

为奴隶已经愤怒了，而且，只要压迫继续存在，这种愤怒就会与日俱增。压迫者无法停止压迫，即使他们自己想要这样，在事实上也不可能。他们知道，如果他们停止了压迫，甚至是削弱了压迫的话，他们就将自取灭亡。所以，尽管他们似乎也关心工人的福利，关心八小时工作制，关心有关妇女儿童劳动法规，关心工人的养老金和工资，但他们行为依旧。所有这些都是欺骗，或者是对奴隶为他们做工的能力的关注。但是，奴隶依然是奴隶，那些主人，离开了奴隶就不能活的主人，却从来也没有准备把自由给予奴隶。

与工人相比，统治阶级处在这样的位置上，犹如一个人已经打倒了他的敌人，并且正在压制着他，他不是不想放开他的敌人，可是他知道，一旦他仅仅是在某一时刻这样做了，他自己就将被打倒，因为他的对手已经愤怒了，并且手中正拿着一把刀子。所以，无论他们的良知是否麻木，我们的富有阶级（与古代那些相信自己有权这样做的人们不同）不可能因为他们从穷人那里窃取的财物而快乐。由于良知与恐惧的刺痛，他们的全部生活和快乐变成了痛苦。

这是经济的矛盾。更尖锐的是政治上的矛盾。

首先，所有人都是在服从国家的法律这一习惯中成长起来的。我们这个时代人们的全部生活是由国家法律保护的，一个人要按照法律结婚和离婚，教育孩子，甚至（在许多国家）宣扬他的宗教。保护人们全部生活的法律是什么？他们相信它吗？他们认为这些法律是善法吗？全然不是！

在大多数情形下，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们并不相信法律的正义；他们轻视它，可是又要服从它。对于古代社会的人们来说，遵守法律是当然的。他们相信，真正地相信，他们的法律（它们大多带有宗教的特征）是真正的法律，是每个人都应该遵守的法律。可是我们？我们知道，也不能不知道，我们的国家、法律并不是永恒的，只不过是由不同的政府

制定的众多法律中的一个——同样地不完善，常常是显而易见地错误和不正义，在报纸上受到了方方面面的指责。对于一个犹太人来说，服从法律是当然的，因为当时他从不怀疑这些法律是由上帝的手指写成的；或者，对于一个罗马人来说也是如此，因为他们认为，指引他们的是宁芙女神埃格里亚（nymph Egeria）。当人们相信，他们自己选出来的国王是由上帝授命的，或者他们相信立法会议想要制定一部最好的法律而且他们有能力做到这一点时，他们也会遵守法律。但是，我们晓得我们的法律是如何制定的。我们都被挡在了幕后，我们知道，法律是贪婪、欺诈和政党纷争的产物，在这样的法律中根本没有也不可能有正义。所以，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们无法相信，服从世俗的或国家的法律能够符合理性或人类本质的要求。人们长期以来就已经知道，服从一部正义性十分可疑的法律是不合理的，所以，在服从一部被认为是不合理和不应遵守的法律的时候，他们只能感到痛苦。

当全部生活已经被法律预先限定，在惩罚的威胁之下他又必须遵守这部法律，而他又不相信这部法律的公道与正义，相反，它的不正义、残忍和虚伪常常显而易见的时候，一个人只能感到痛苦。我们认识到海关和进口税是无用的，可是我们却不得不向他们交税。我们知道用于维持法庭和许多等级的政府机构的开支毫无用处；我们知道教会的教义的邪恶影响，可是我们却必须参与维持这些机构的活动。我们认为由法律所给予的惩罚是残忍和不体面的，可是却不得不参与这些行为。我们认为现实的财产分配是不正义和邪恶的，可是我们却必须服从它。我们不承认军队和战争的必要性，可是我们却不得不承受令人恐怖的负担去支持它们。

然而，与我们在国际关系中所面对的一切相比，这个矛盾却是微不足道的，在理智甚至整个人类的生存都面临着威胁的情况下，现在迫切需要一个答案。这就是基督教意识与战争之间的矛盾。

我们都是基督教国家，我们有着共同的精神生活，所以，一旦一种高尚而有价值的思想在世界的某一个角落产生，马上就会传遍整个基督教世界，并且使不同国籍的人们感到快乐和自豪。我们不仅热爱其他国家的思想家、慈善家、诗人和有知识的人，为神父丹米恩 (Father Damien) 而骄傲，就好像他是我们自己一样，而且我们也爱其他国家普通的人们：法国人、德国人、美国人、英国人。我们不仅尊敬他们的品质，而且乐于与他们见面，面带微笑向他们致意；我们不仅不能把与他们之间的战争看作是成就，我们甚至也不能有这样的想法：我们之间可能发生的任何分歧都一定要通过杀人来解决。可是，我们所有人却被号召参加战争，这种战争即使今天没有发生，明天也是不可避免的。

对于犹太人、希腊人或者罗马人来说，这是当然的，他们不仅要用屠杀来保卫他们的人民独立，而且也要用屠杀来征服其他民族。当时，他们坚定地相信，只有他们自己才是为上帝所爱的、惟一真正善良的人，而其他民族都是菲力斯人 (Philistines) 和野蛮人。中世纪的人们和生活在本世纪 (19 世纪) 初期的人们也相信所有这一切。可是如今，无论我们觉醒到了什么程度，我们都再也不能相信这些，在我们的时代，这个矛盾已经是如此令人无法容忍，我们感到，如果这些问题不得到解决，已经无法继续生活下去。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矛盾的时代，” 国际法教授科马洛夫斯基 (Komaróvsky) 伯爵在一篇著名论文中这样写道。

所有国家的新闻界都在表达着对于和平的普遍愿望以及和平对于所有国家的必要性。政府的代表、官方机构也说着同样的事情，这些观点也在议会讲演、外交辞令，甚至是国际公约中反复地重复着。可是，每一年政府都在增加它的军事力量，征缴新的税收，增加贷款，把为当今的愚蠢政策付款的义务当作遗产留给未来的一代。言论与行动的矛盾

是多么昭然若揭！

当然，通过指出所有这些军备的防卫特征，政府能够证明这些措施是合理的，可是，在每一个公平的观众看来，这仍然是令人困惑的，预计中的攻击来自何处？因为所有的大国都不约而同地追求着纯粹的防卫政策。

事实上，每一个这样的大国似乎在每一刻都在预计会受到另一个大国的进攻，其结果便是普遍的不信任和每个政府为了超过其他国家的军事力量而做出的超常努力。这种竞赛本身便增加了战争的危險。这些国家无法长期承受军备的增长，或迟或早要诉诸战争以应付现实的不利处境和长期的威胁。这样，一个无关紧要的原因便足以点燃整个欧洲的战火。以为这种危机可以解决困扰我们的政治、经济问题的假想是错误的。最近的战争经验告诉我们，每一场战争只不过是激怒了这些国家之间的敌意，使他们的军事负担变得更加不堪承受，使欧洲的政治、经济形势比以往更加令人担忧和混乱。

“当代欧洲保持着九百万全副武装的机动部队”，恩里克·费里（Enrico Ferri）这样说道，“再加上 1500 万预备役人员，每年要在他们身上花费四百万法郎。军备本身使得社会与个人福利资源愈加陷于瘫痪，这就像一个人为了拥有一支枪而造成营养不良——因而丧失了使用他刚刚拥有的这支枪的力气，在这样的重压下，他终将崩溃。”

1887 年 7 月 26 日，在国家法律改革与编纂协会（the Association for the Reform and Codification of the Law of Nations）成立之前，查尔斯·布斯（Charls Booth）在伦敦的一次讲演中也说了这件事。在引证了超过九百万的现役军人和 1500 万的预备役人员、各国政府为保持这些军备而支付的巨大开支这一同样的数据之后，他继续说：

不过，这仅仅是实际开支中的一小部分，因为，在每个国家军事预算中记载的数字以外，我们必须考虑到由于从工业生产中撤走这些强劳

动力而造成的社会损失,以及投入到战争准备和那些绝对没有生产功能的设备的巨额资本的利息损失。军备开支的必然结果就是国家债务的稳定增长。欧洲国债的总和,到目前为止它的很大比例是与战争的目的连结在一起的,已经达到了46.8亿英镑,而且这一债务在逐年增长。

科马洛夫斯基还说道:

我们生活在一个极其艰难的时代。我们到处都能听到有关工商萧条以及一般的经济形势恶化的报怨:人们在指责劳动阶级的生活困境和社会大众的普遍贫穷。可是尽管这样,各国政府却在极力保持它们的独立,并达到了极度疯狂的程度。在每一个地方,他们都发明了新的税种和关税,这些国家的财政压力是没有限度的。如果我们看一看欧洲各国近一百年来的财政预算,我们不由为它的逐年递进和快速增长而感到惊讶。我们如何解释这一使我们早早晚晚必然破产的极端现象?

这种现象是由于吞噬了三分之一甚至近一半的欧洲国家预算的军费开支造成的。在这种联系中最可悲的是,无法预料这种预算增长的极限和大众贫穷的极限。什么是社会主义?不过是一种反对这种不正常情况的主张,在这种不正常的处境中,我们欧洲的绝大部分人口都可以看到他们自己。

“我们在自我毁灭,”弗里德里希·帕斯(Frédéric Passy)1890年在最后一届伦敦世界和平大会(Congress of Universal Peace)的发言中说,“在参与未来屠杀的准备中,或者为了支付过去的那些狂人和万恶的屠杀留给我们的债务。为了能够相互残杀,我们饥饿而死。”

随后,在谈到法国人如何看待这一主题时,他说:“我们相信,在《人权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发表一百年以后,我们已经来到了一个反省国家的正当性的时代,立即并且永远断绝与那些建立在武力和欺诈基础上的事业之间的联系的时代,这些在征服名义下

的事业是真正的反人类犯罪，无论在什么程度上被看作是国王的虚荣或者国家的骄傲，这些事业甚至将使那些在表面上从中获得了利益的那些人变得衰弱。”

“我常常是异常地惊讶，” 维尔弗里德·劳森 (Wilfrid Lawson) 先生在这次大会上说，“按照宗教在我们这个国家的运行方式，你把一个孩子送到主日学校 (Sunday School)，你将告诉他：‘亲爱的孩子，你一定要爱你的敌人。如果别的孩子打了你，你不要反击他，而要试着用爱去感化他。’好的，这个孩子在 14 岁或 15 岁之前一直呆在主日学校里。随后，他的朋友们说：‘送他去军队。’他在军队里能做什么？他确实不会爱他的敌人，如果他真的面对敌人的话，他将用刺刀刺穿他的身体。这就是这个国家里宗教教义的本质，我不认为这是执行宗教规则的最好方式。我认为，如果一个孩子爱他的敌人是好事的话，对于成年人来说，爱他的敌人也应该是好事。”

随后，他又说：“在欧洲，有 2800 万全副武装的人，用互相之间的谋杀而不是用对话来解决纷争。这是基督教国家之间人们共同接受的解决纷争的方式。同时，这一方法也是代价昂贵的，因为据统计，我已经知道，自 1872 年以来，欧洲各国已经把令人难以置信的 15 亿英镑用于解决分歧的准备，这种解决分歧的方法就是相互厮杀。在我看来，根据现在的情形，我们必须承认这样一点或两点：或者基督教是一个失败，或者那些声称在解释基督教教义的人并没有真正这样做。”

“在我们的装甲车撤退之前，在我们的军队解散之前，我们都没有资格称我们自己是一个基督教国家。” F.乔伊特-威尔逊 (F. Jowett-Wilson) 先生说道。

在一场有关基督教会牧师宣传反战言论的责任的对话中，G. D. 巴特莱特 (G. D. Bartlett) 谈到其他事情时顺便说：“如果我完全理解了《圣经》的话，我要说，人们是在全然忽略了这一问题的同时（那就是，从

来不讨论战争问题) 来理解基督教的。” “而且在我一生之中, 听到我的牧师宣讲普遍的和平的时候也不过五六次。大约 20 年以前, 在一间画室里, 当时室内有 40 或 50 个人, 我斗胆提出了战争与基督教不相容的观点。我们这种没有战争也可以生活下去的观点却被认为是极其虚弱和荒唐的。”

罗马天主教修道院院长德福尼 (Defourney) 亲身体会了同样的精神:

铭记在人类良知之中的永恒律法的首要规则之一, 就是不要伤及人的性命, 没有正当的理由、不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不能使人类流血。这是铭记在人类心灵中的永恒的律法……可是, 这却是一个有关战争的问题, 是一个流血漂杵的问题, 现时代的人们并不为正义的理由而忧心。那些投身战争的人们, 并没有虑及这无数的谋杀是否正义, 亦即, 战争或者被称为战争的事情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 合法的还是不合法的, 是合理的还是罪恶的? 是否违反了没有正当的理由便不许杀人的基本法律? 他们的良知在这个问题上泯灭了。在他们看来, 战争已经不再是依赖于道德的行动, 在军营的劳苦与危险之中, 最大的快乐莫过于胜利, 最大的悲哀莫过于失败。不要对我说“他们在服务于国家”。很早以前, 一个伟大的天才说了这些话, 这句话已经成了格言: “没有正义, 所谓皇帝难道不是大的匪首?” 那些匪帮不也就是小皇帝吗? 匪帮也有自己的法律或习俗, 根据这些法律, 他们就是统治者。他们也为战利品的斩获和匪帮的荣誉而发动战争。……

这个机构的目的是(他说的是一个国际法庭的成立) 是使欧洲各国再也不是强盗的国家, 他们的军队也不再是抢劫团伙 — 应该再补充一句, 不仅是抢劫者而且是奴隶。是的, 这些军队显然是一群奴隶, 听任一个或两个指挥官或部长处置的奴隶, 如我们所熟知的那样, 他们对这些奴隶实行专制统治而不负任何真正的责任。

奴隶的特征就在于, 他只是主人手里的工具, 是财产而不是人。这正是那些士兵、官员和将军的特征, 他们按照一个统治者或许多统治

者的专横意愿去杀人或被杀……这种军事奴隶是不争的事实，这是最糟糕的奴隶形式。特别是在当今，通过强制服兵役的手段把奴隶的镣铐强加在每一个强健而有能力的人的脖子上，使他们成为杀人的工具、职业杀手、食人肉的屠夫——因为这些正是让他们接受训练的目的。

两三个统治者在他们的音乐会的包厢里秘密会面，没有任何仪式和公开性，所以也就没有任何责任，便把人们送上了战场。

“反对把沉重的军备负担强加于人民身上的主张，在我们这个时代之前就有人提出来了，” E. G. 门内塔 (E. G. Moneta) 先生说。

看一看孟德斯鸠 (Montesquieu) 在他的时代是怎样写的：“法国”（现在我们应该说是“欧洲”）“将会毁于她的士兵之手。一种新的疾病正在欧洲蔓延，它已经感染了我们的君主，迫使他们去维持令人难以置信的军队的数量。这场疾病是爆发的，所以也具有传染性，以至于在一个国家增加军队数量时，其他国家也马上照样去做。所以，除去共同毁灭以外，我们什么也得不到。”

“每一个保持着尽可能多的军队的政府是那种受到毁灭威胁的国家，每一个如此紧张的国家根本反对的就是‘和平’。欧洲就是这样衰落的，如果每个人的境况都与我们这个大陆上的政府相同的话，他们之中那些最富有的人们将无以为生。尽管我们拥有了整个世界的财富，可我们却是贫穷的。”

这些话写于大约 150 年前，然而，它却似乎是当代世界的写照。惟一变化了的就是政府形式。在孟德斯鸠的时代，保持庞大的军队的原因被认为是国王的专制权力，出于增加私人财产和获得征服荣誉的目的，他们发动战争。

人们说：“啊，如果每个国家能够选出这样一些人，他们有权拒绝把士兵和金钱交给政府，那有多好，那将是战争政策的终点。”可是，现在欧洲各地几乎都是代议制政府，而军费开支和战争准备也达到了令

人吃惊的程度。

很明显，国王的愚蠢已经传给了统治阶级。现在，战争的原因已经不再像路易十四时代那样，不是因为一个国王对另一个国王的情妇无礼而发动的，而是因为国家尊严的荣誉感和爱国主义情操已经达到了如此夸张的程度，一个国家反对另一个国家的公众情绪已经被刺激到了这样一点，以至于说（即使那些新闻可能是不真实的），一个国家的大使已无法为另一个国家的首脑接受，要发动有史以来最可怕、最有破坏性的战争就足够了。欧洲拥有比伟大的拿破仑战争时代更多的士兵。我们这个大陆上的所有公民，很少有例外，都要被强制在兵营里生活几年。要塞、兵工厂和军舰在建造，军备在持续不断地制造，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要更新——因为，悲哀地说，本应被用于人类福利事业的科学，却被用在毁灭性的工作上，不断地发明新的能够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杀害尽可能多的人的杀人方法。

为了维持数量如此庞大的军队和战争准备，每年要耗费数以百万的人力，耗费了那些本应用于教育人民、执行一项最大规模的公共工程以及本应用于可能的社会问题和平解决的资金。

除去我们在科学上的成功之外，欧洲在这一方面，与最糟糕的野蛮的中世纪是同样的境况。每个人都在为这种既不是战争也不是和平的处境而感到悲伤，所有人都想从这里逃出去。各国政府的首脑都宣称，他们希望和平，一个一个地竞相发表神圣的和平宣言。可是同一天或者第二天，他们又向立法会提交了一份增加军备的建议，并且说，他们做好这一防范措施是为了保证和平安全。

然而，这并不是我们所期望的和平！各国也没有因此而上当。真正的和平是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的，而这规模庞大的军备所表明即使不是各国之间相互隐瞒仇恨，也是缺乏信任。我们怎么能说，一个想要向他的邻居表达友谊的人，把他的邻居请来讨论某些问题，可是他的手里却拿着一支装满子弹的左轮手枪。

这便是各国政府的和平表白与它的战争政策之间的尖锐矛盾，所有

善良的公民都渴望以任何代价终结这一矛盾。

人们都为欧洲每年发生的六万起自杀事件而感到惊讶，这一被承认和记录的案例总数还不包括俄罗斯和土耳其；可是，他们更应该惊讶的是，为什么自杀的人数如此之少。我们时代的每个人，如果我们足够深入地探究他的良知与他的生活之间的矛盾的话，就会发现那是最令人绝望的环境。不要说充满我们生活中的其他那些生活与良知之间的矛盾，仅仅是欧洲持续不断的军备条件与它的基督教信仰之间的反差本身，就足以把任何人推向绝望，就会诱使他终结在这个不合理的和残忍的世界里的生命。这个矛盾——是所有其他矛盾的本质——是如此的可怖，要在这种矛盾的状态下生活，惟一可能的就是完全不去想它和忘掉它。

什么！我们都是基督徒，不仅宣称相互友爱，而且实际上也体验着一种共同的爱；我们的社会跳动着相同的脉搏；我们互相帮助，互相学习，爱的纽带使人们愈来愈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为我们创造了共同的幸福，这种同情心使我们的生活具有了意义。可是明天，某个疯狂的统治者却会说出一些蠢话，另一个统治者也会做出同样的回答，于是，暴露在谋杀危险之中的我，就必须去杀那些没有伤害过我的人，此外，这个人还是我所爱的人。这不是一种可能性极小的偶然，而是我们所有人都要准备应付的事情，这种事情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

要清楚地知道，这足以驱使一个人失去理智或者杀死他自己。这正是所发生的事情，特别是在军人中间经常发生的事情。一个人只能在某一时刻自我觉醒而被推向这一结局。这也是惟一能够解释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们为什么如此强烈地沉醉于葡萄酒、烟草、鸦片、纸牌、读报、旅游，以及其他一切娱乐消遣的原因。这些事情是被当作严肃而重要的职业来做的。它们在事实上真是重要的事务。如果没有这些外在的使人麻木的手段，半数人类都会自杀而死，因为矛盾的生活是人的理性最难以

容忍的环境。现代世界的所有人都处于一种尖锐而持久的良知与生活方式的对抗之中，这种对抗不仅体现在经济关系上，同时也体现在政治关系上。不过，所有这些矛盾之中最突出的，还是存在于人的良知之中的基督教人人皆兄弟的律法与每个人都要准备应付仇恨和谋杀（在支配每个人的普遍的强制兵役法的控制之下）之间的矛盾——每个人在是一个基督徒的同时，又要是一个角斗士。